

怎样研究鲁迅的翻译

王宏志

关于鲁迅的翻译活动,有好几个问题是颇值得思考的。

1909年,鲁迅、周作人兄弟自费译印出版《域外小说集》一、二册,虽是“收录至审慎,移译亦期弗失文情”^①,“字字忠实,丝毫不苟”^②,结果却落得惨淡的收场,在东京和上海各只买得二十余册^③。就如鲁迅自己所说,这次翻译活动可算“大为失败”,“现存

①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卷,页155。

②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页54。

③ 鲁迅:《〈域外小说集〉二序》,《鲁迅全集》,第10卷,页161。

的便成珍本,但谁也没有珍视之”^①,但另一方面,他们这次翻译活动主要针对的对象——不懂外文的林纾所作的翻译,虽是“任情删易”、“误译很多”^②,但却大受欢迎,不单出现“伤心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现象,就连鲁迅兄弟自己也曾经抱有近乎盲目的崇敬:“只要他印出一部,未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钉书店去,改装纸板封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③。甚至到了1960年代,钱锺书仍然说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而不愿意读哈葛德的原著^④。为什么会这样?

1929至1930年间,鲁迅与梁实秋爆发了现代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场广为注意的论战。在这场论战里,梁实秋批评了鲁迅的“硬译”,而鲁迅则指责梁实秋等宁顺而不信、错译连篇。可是,“硬译”一词本来是由鲁迅提出的,他也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的翻译是硬译,又说希望有更出色的译者能对他的译本“解散原来句法,并将术语改浅,意译为近于解释,才好”^⑤。另一方面,在梁实秋所开列的坏的翻译的三个条件中,首两个都是鲁迅提出的:“(一)与原文意思不符;(二)未能达到‘原文强悍的语气’”^⑥。由此看来,鲁迅、梁实秋二人对于翻译的态度并没有存在很大的歧异,但他们的论战却这么炽热,为什么会这样?另外,有趣的是,鲁迅跟梁实秋有关翻译问题的文章之中,最重要的一篇题为《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梁二人在争论翻译的同时,又在“文学的阶级性”这一问题上猛烈交锋,为什么会这样?

1931年12月5日,瞿秋白写了一封信给鲁迅,讨论翻译的问

① 鲁迅1932年1月6日给增田涉信,《鲁迅全集》,第13卷,页474。

② 鲁迅1932年1月6日给增田涉信,《鲁迅全集》,第13卷,页473。

③ 周作人:《鲁迅与清末文坛》,《关于鲁迅》(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457。

④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翻译论集》,罗新璋(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页719—720。

⑤ 鲁迅:《〈艺术论〉小序》,《鲁迅全集》,第10卷,页285。

⑥ 梁实秋:《论翻译的一封信》,《新月》月刊第4卷第5期(1932年),页4。

题。12月28日,鲁迅写了回信,并且把两封信一同发表在《十字街头》上。1932年6月20日,瞿秋白再写了一封信,以《再论翻译——答鲁迅》为题目,刊登于《文学月报》。对于瞿秋白这第二封来信,鲁迅并没有回答。我们知道,瞿秋白和鲁迅当时都是左翼文学阵营内的战友、领导,而且,他们二人在见面后更发展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革命友谊来。不过,尽管他们都同意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是重要的任务,也同意翻译除了能够介绍作品的内容外,还可以“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但瞿秋白曾经明确地批评鲁迅的翻译只是“做到了‘正确’,还没有做到‘绝对的白话’”^①;而且,在鲁迅清楚表明“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②之后,瞿秋白更毫不含糊地指出“这是提出问题的方法上的错误”,又说“我主张根本不要‘容忍多少不顺’的态度”^③。为什么会这样?

毋庸置疑,鲁迅具备了任何译者都会艳羡的资历和条件:高水平的汉语和外语能力、湛深的学术修养、丰富的翻译经验,还有严谨的翻译态度。与此同时,鲁迅的创作成就又是这样的骄人:不要说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个重要文类——小说和杂文——几乎都是由鲁迅所奠基的,就是在诗歌、散文以至散文诗方面,鲁迅也作出重大的贡献。可是,我们却可以在他的译文里找到这样一句怎样也读不通、读不明白的句子来:这时候,要来讲助那识别在三次元底的空间的方向的视觉底要素的相互的空间底距离的,谁都知道的眼睛的构造,大约是没有必要吧^④。为什么会这样?

早从留日时期开始介绍和翻译外国作品起,终其一生,鲁迅对于翻译始终坚持不懈,在不同的阶段翻译了大量不同类型的作品。

- ① 瞿秋白:《论翻译:给鲁迅的信》,《翻译论集》,页282。
- ②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页382。
- ③ 瞿秋白:《再论翻译:答鲁迅》,《翻译论集》,页282。
- ④ 鲁迅(译):《艺术论》,《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5卷,页225。

有人统计过,鲁迅翻译的文字超过300万,比著作的文字还要多^①。而且,早从《域外小说集》的序言开始,鲁迅便经常探讨翻译上的重要问题,即使在去世前一年,他还撰文认真讨论翻译^②,充分显示他对翻译有独特的见解。毫无疑问,鲁迅是现代中国一位极为重要的翻译家。那么,有关鲁迅翻译的研究情况又怎样?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是:当鲁迅著作里的每一个字都几乎被反复咀嚼研究时,他的翻译却偏偏被忽略了;不要说迄今国内还见不到一本关于鲁迅翻译活动的专论^③,就是深入研究鲁迅翻译的文章也为数不多。我们只要看看80年代出版的两本《鲁迅研究资料索引》,便可以看出其中的不合理性。《鲁迅研究数据索引》(下册)收录了1949年10月至1965年6月间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全书共456页,但有关鲁迅的翻译的,只占3页,共38项^④;另外,收录1977年1月至1981年12月间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的《鲁迅研究资料索引(续编)》,全书共675页,但有关翻译的不足两页,只有16项^⑤。必须强调,这个情况在1980年代以后并没有得到改善,实在令人感到困惑。为什么会这样?

在尝试响应以上的几个问题前,也许可以看看我们过去一些有关翻译的理论。

从历史上看,我国有关翻译的讨论都几乎毫无例外地集中在处理“直译”和“意译”的问题上。从东晋道安针对佛经翻译提出的“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⑥的直译主张,到六朝鸠摩罗什批

- ① 全灵:《从“硬译”说起》,《鲁迅研究文丛》第1辑(1980年3月),页320。
- ② 鲁迅:《“题未定”草(2)》,《鲁迅全集》,第6卷,页352—353。
- ③ 相反来说,在西方有人以鲁迅的翻译活动作为博士论文题目:Lennart Lundberg,“Lu Xun as a translator; Lu Xun'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1903—1936”(Stockholm: Orientaliska Studier Stockholm University, 1989)。然而,必须指出,这篇论文的学术水平不能令人满意。
- ④ 北京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鲁迅翻译研究资料索引》(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页265—268。
-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鲁迅研究资料索引》(续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6年),页485—487。
- ⑥ 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翻译论集》,页24。

评“失其藻蔚”的翻译“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①的意译观念,一直到上文提到的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还有各种各样的翻译标准,如被奉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的严复的“信达雅”^②、马建忠的“善译”^③、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④,以及傅雷“神似”“形似”^⑤的讨论、钱锺书的“化境”^⑥说等,虽然表述不一,但其实始终纠缠在同一个问题上:究竟译者应该以怎样的方法来重述原文,才算是完成翻译的任务?从译者的角度看,这种关注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很合理,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准确而流畅地把原著的内容以译文文字重现出来。于是,人们评定一篇翻译作品时,都会把焦点集中在内容的忠实和行文的流畅两方面:一篇好的翻译必然是既忠实又通顺的;相反来说,不好的翻译不是在内容上有错误,就是佶屈聱牙,无法卒读。然而在一般的讨论里,忠实的翻译是直译的结果,意译的译文便流畅通顺,忠实和通顺往往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的位置。而且,令人感到沮丧的是,经过一千多年来众多精英知识分子的反复讨论,对于“翻译的标准”这个可以说是翻译学上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一个获得普遍认同或较为圆满的答案,什么既忠实又通顺的翻译始终只是一个虚拟的神话,“神似”、“化境”等要求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空话。

其实,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把翻译看成一项纯粹的文字活动,一种以原著为中心的文本转移活动,同时把翻译活动抽离于实际的操作环境以及文化状态,脱离译文文化,甚至脱离读者的阅读期待和阅读模式。在这些传统的论述里,翻译就是要追求和原著一模一样的译本。这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因为面对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读者、不同的社会政治因素,甚至不同的

① 鸠摩罗什:《为僧睿论西方辞体》,同上,页32。

②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同上,页136。

③ 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同上,页126。

④ 林语堂:《论翻译》,同上,页418。

⑤ 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同上,页558。

⑥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同上,页696。

年代,难道还能够期待产生完全相同的译本来吗?在这样的情形下,翻译便面对很严重的问题:人们无法找到“完美”的翻译,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找出一个“相对”的“真实”,也就是所谓的“像真”,结果便出现了什么“直译”和“意译”、什么“形似”和“神似”、什么“等值”、什么“化境”……诸如此类标准,但这些其实都只不过是不同形式的让步、妥协、修正。这是一个两难局面的必然结果:一方面以原著为中心,竭力追求跟原著吻合,但另一方面又知道根本不可能跟原著完全吻合,最后,所有的译文都难以令人满意,都是不合格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译文便会遭受歧视,因为它只不过是原著的一件拙劣的冒牌复制品,而翻译工作也变成了一种东施效颦式的模仿,会对原著造成“破坏”——这就是“*traduttore traditore*”(“翻译者即反逆者”)的来源。

除了以上问题,更重要的是,不同的译者在不同的文化空间进行翻译的时候,往往会有不同的考虑,很多时候,这些考虑都远远超出了所谓忠实和通顺的范畴,有的甚或存心要为译文读者提供一个特殊的文本。不同的译者面对着同一部作品,往往基于这些考虑,如时、地、人等因素的差异,以至于在选择怎样去进行翻译时,会作出不同的决定,结果译出来的作品也很不同。事实上,即使是同一位译者,面对着同一本作品,在不同的时间或环境,也会做出不同的翻译决定。这些足以证明“原著中心论”者尝试提出一些超然的、“客观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是不切实际的,其原因即在于翻译实际上是对原文做出或多或少的重写(a re-writing of the original)。

另一方面,读者在阅读译文时,其实也不会把原著放在心里,他们面前唯一的文本便是这篇译文,所以,译文是独立于原文以外而自我存在的文本。我们时常听到这样一个说法:懂原文的人一定不去看译文。这种说法的基本出发点是以原著为中心,而背后的含义是要贬低翻译的地位,对翻译抱不屑一顾的态度。不过,把这句话倒过来看,却揭示出两种不同的情形:一、不懂原文的,一定要看译文;二、看译文的,都不懂原文。这两种不同的情形,又可以

进一步引申出两个不同的重要概念:前者足以证明译文的重要性——译文有值得去读、甚至非读不可的理由,因为人们根本不可能学会全世界所有语言以便阅读所有原著;而后者则足以证明译文的独立性——译文是独立于原著以外而自我存在的文本。举例说,尽管中国读者会说自己在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是小仲马的《茶花女》,但实际上完全没有碰触过托尔斯泰或小仲马原来的作品;然而在一般情形下,读者都不会说自己在看中译本的《战争与和平》或《茶花女》。表面看来,这好像是在贬低译文的地位,但实际的意义正好相反;这个现象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在中国读者眼中,中译本的《战争与和平》或《茶花女》便是他们的原著了。由此可见,对译文读者来说,所谓的“译文”是不存在的,原著和译文的对应观念,是毫无意义的。英国比较文学及翻译研究学者 Susan Bassnett 曾经说过,翻译论争里面一个最大的讽刺,就是不少学者在否定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翻译的同时,却又以翻译作品作为教材,来教导单语学生外国文学,而这些学生在阅读这些翻译作品时,“就好像它们是以自己的语言写出来似的”^①。这种现象固然是一个讽刺,但同时也具有很积极的意义,正好说明人们本来就已经不自觉地认同了翻译作品的价值,也就是认定了原作的生命来自翻译。要让翻译的地位得以确立,最重要的便正是要让人们愿意阅读翻译作品,“就好像它们是以自己的语言写出来似的”。

由此可见,有意义的翻译研究必须走出这个“原著中心论”的困局,走向译入语的世界,结合译入语语言、文化、政治、社会等因素去进行考察。在西方翻译研究界,早自 1970 年代中开始就出现了典范的转移(paradigm shift),提出以译入语文化作为考察翻译成果和翻译现象的主要元素,原因就是不少研究者都看出以传统“原著中心论”的研究理念,根本无法合理地解释许多翻译现象和

问题;同时,他们也清楚明白,要把翻译研究建立成一门独立而有价值的学术学科,这样的典范转移是很有必要的。

回到鲁迅翻译的问题上,显而易见,文章开首所列出的一连串问题,是完全无法以传统的原著中心论来回答的。假如翻译研究只是为了追求忠实而通顺的译本,我们怎样可以解释一点也不忠于原著的林纾会大受欢迎,而忠于原著的鲁迅反而备受冷落?怎样可以解释同样具备了优秀的译者条件的鲁迅、梁实秋以及瞿秋白在翻译问题上会有这样悬殊的看法?怎样可以解释鲁迅译出那些真的是不能卒读的译文?

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从中国当时的文化、历史和政治的角度入手,便能够找出问题的核心,为这些好像很令人疑惑的问题提供满意的答案。举例说,林纾的意译西方小说大受欢迎,是由于晚清的读者对林纾译笔的赞赏,也跟林纾和他的合译者在选取翻译题材方面能满足读者有关,这点从时人对林译《茶花女》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来:

以华文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曲曲以赴,煞费匠心,好语穿珠,哀感顽艳,读者但见马克之花魂,亚猛之泪渍,小仲马之文心,冷红生[林纾]之笔意,一时都活,为之欲叹观止。^①

另一方面,当晚清的读者仍然沉醉于林纾的桐城译笔的时候,藉藉无名的“周氏兄弟”竟然以生硬晦涩的“直译”笔法来译介一些全不知名的东欧作者(更不要说鲁迅自己所提的理由:《域外小说集》内的短篇小说篇幅过短,不合中国读者的口味^②),又怎么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可见,这些现象必须置于整个晚清翻译大潮的文化里审视,才可能有较满意的解释。

^① Susan Bassnett,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Revised Edition, p. 4.

^① 丘炜菱:《茶花女遗事》,《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陈平原、夏晓虹(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29。

^② 鲁迅:《〈域外小说集〉二序》,《鲁迅全集》,第10卷,页163。

同样地,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以及他跟瞿秋白的分歧,也是要联系当时的文化、社会及政治等元素去进行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中的问题及意义。不能否认,鲁迅在1930年代翻译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及作品时,确有过于直译以致硬译、死译的情况出现,这现象本身是显而易见的,并没有值得讨论的地方,所以不该是我们评论鲁迅的译作、他的翻译活动及贡献时的焦点所在——尽管这确是人们过去所采纳的方法,也是造成鲁迅的翻译活动没有受到足够注视的原因。事实上我们应该探讨的是:为什么鲁迅会“选择”以这样的译笔来进行翻译。毫无疑问,以鲁迅的中外文语文水平,要译出流畅易晓的译文是轻而易举的,只是这并不是鲁迅翻译的动机,他是以一种非常急切甚至激动的心态来着手翻译马列主义作品的。经历了1928年与创造社成员展开的“革命文学”论争后,鲁迅感到双方都缺乏足够的知识,实在有必要把一些有用的理论翻译过来。下引鲁迅这段话其实是说得很沉重的,特别是它出现在鲁迅反驳梁实秋的攻击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里:

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糊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调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 Prometheus 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驱。^①

此外,鲁迅还说过,翻译“不但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理由是他认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②。

正因为这样,他刻意在文句上追求直译,甚至提出要“逐字译”,最后造成硬译、死译的结果。从这样的研究角度切入,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更多更有意义的课题,例如为什么鲁迅会认为中国语文的表达方式贫乏和不够精密?这样的观点跟整个社会的认识是否一致?这样的观点跟他的文学观、语言观以至政治观的关系是怎样的?鲁迅透过什么渠道认识翻译与语文改革的关系?鲁迅的翻译怎样体现这种语文改革的尝试?鲁迅理想中的中国语文跟外国语文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跟所谓的“翻译文体”又有什么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鲁迅翻译研究中值得深入探讨、而又不是传统以原著为中心的翻译观所能理解的。

其实,只要扬弃传统过于偏狭的翻译观,鲁迅翻译研究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可以远远超越文本的范畴,进入更重要的文化层面。我们可以把鲁迅的翻译活动联系当时整个文艺以至政治运动的面貌,鲁迅在文艺运动里的位置和贡献,这个位置和这些贡献跟鲁迅的翻译活动的关系,其他的政治、文学以至翻译活动及其参与者怎样响应鲁迅的翻译,一般读者怎样响应鲁迅的翻译等,这样才能展示鲁迅翻译的真正价值。此外,鲁迅翻译活动上的转变及其原因、鲁迅选译作品的条件、鲁迅与同时期其他译者的比较、鲁迅的译论及译作跟前期和同时期的译论及译作的比较、鲁迅在翻译上跟其他人的合作或抗衡等,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透过这样的文化层面去探究鲁迅的翻译,除了能够更清楚了解鲁迅翻译活动的真正面目和意义外,还能展现更大的文化图像。这不但能够带来鲁迅翻译研究的突破,就是在整个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上,也会造成新的冲击。毕竟,谁能够否认翻译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

^① 《鲁迅全集》,第4卷,页209。

^②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页382。